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3)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3)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复 旦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3)
ISBN 978-7-5325-4764-7

I. 中... II. ①复... ②中... III. 学科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0750 号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3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6 $\frac{8}{18}$ 插页 5 字数 360,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4764-7

K·1020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3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诚 朱荫贵 吴景平 张济顺 张晖明

陈思和 林尚立 金光耀 金冲及 姜义华

顾云深 章清 熊月之 戴鞍钢

执行编辑:章清 孙青 乐敏

责任编辑:李志茗

本刊实行匿名评审

编者的话

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已经出版了两辑。继一二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与“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主题之后，本辑确定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论文主要来自2005年9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我们与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

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这一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正越来越成为有关近代中国研究及各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由狭间直树和熊月之的先驱性研究，以及对全球化日益浓厚的兴趣所带动，在过去10年间，这一过程已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狭间直树教授1993至1997年间在日本京都人文学科研究所主持了名为“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与明治日本”）的计划。该项课题旨在探究“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时及中国传统文明重新塑造的过程之中，梁启超及明治日本所发挥的作用”。1999年出版了日文本《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中文版《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也已问世。同时，参加这个计划的两位外国学者巴斯

蒂 (Marianne Bastid-Bergère) 及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回国以后分别于 1995 年在法国 Garchy 及 1998 年在美国 Santa Barbara 主持及筹备了同名的研究计划。后者于 1998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举行了“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 并于 2004 年出版了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5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而在朗宓榭教授主持下, 德国方面也展开了多项课题的研究, 先是 1996 年至 2001 年间的“近代中国科学术语形成的研究”(WSC); 还与意大利罗马大学合作了“耶稣会资源中的中国新词”的研究, 和 Kansai 大学一起建立了“西学在华传播的电子文献库”。上述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下列著作中: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edited,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it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还编制了相关的综合数据库《关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初中国科学、哲学和政治学术语的数据库》(目前已有部分内容可以在 <http://www.wsc.uni-erlangen.de/wscdb.htm> 网页看到)。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就建立起合作关系, 并共同参与了多项课题的研究, 除国际性项目“中西学术交流: 历史与哲学的维度”外, 双方还共同申请了课题“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德国学术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上述会议的召开也是由这些课题所催生的。2006 年 8 月, 德国方面也举办了“Exchange of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学术研讨会。

在中文世界,早在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就开展了“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计量研究”(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得到香港政府(RGC)的资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则组织了“中国近代知识建构与知识传播研究群”,该所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辑(2006年6月出版)便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建构,1600—1949”专号。围绕“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大陆学术界主要在这样一些环节取得了较大成绩。首先是资料的发掘,主要集中于教育史资料的发掘上,这其中包括《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而《民国丛书》一至五编的出版(共收书1126种),也大大方便了此问题的展开。其次在围绕中西文化交流展开的研究中,大多也涉及到学科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了各种现代学科是如何传到中国的。如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樊洪业、王扬宗著《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登阁、周云芳著《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赵德宇著《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反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粟洪武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最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围绕“国学”或“中学”的转型所进行的研究,关注到西方的学术分类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学科定位问题。先是陈平原出版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此后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卓有成绩的研究者,也出版了高水准论著,如罗志田出版了《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桑兵出版了《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等。大致可以说,中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学科在近代的走向,倾力较多,成绩也最为突出。相较而言,直接讨论“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的尚不多见,主要有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但在某些单一学科的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同时围绕各新学科术语在中国的确立,也做了不少文章。前者如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后者如王冰《我国早期物理学名称的翻译与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沈国威《译名“化学”的诞生》(《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 年第 1 期)等。

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纷纷聚焦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这一课题,绝非偶然。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中西交融下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今天的中国早已习惯用西方现代学科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采纳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西方学科体系,相应的,也摈弃了“中学”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基本框架的分类体系。此所意味的是,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下,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思想资源,转而采纳西方现代型的知识样式。故此,基于现代学科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 20 世纪最初 10 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

为重要的分水岭。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知近代中国的问题(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就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来说,这个时段的意义,也值得重视。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新革命与日本》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内中所确立的时间线索,或还不无可议之处,但所指陈的倒是紧扣了学科形成的脉络,可以作为审视中国现代学科成长的视野。

确立中国现代学科成长的起点与结点,无疑是困难的。将此确定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多少预示着此与“西学”传播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即便其成长的时段主要是晚清,也有必要上溯到明清之际,以寻求问题的起点。这一过程,通常表述为“西学东渐”,或更准确地称为“西方知识对东方的渗透”。然而,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固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但所援之“西”为何,本身即是问题。围绕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就不乏这样的追问,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学知识,是否能代表斯时的西方文化?李约

瑟(Joseph Needham)特别指明了,即便耶稣会士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对此也有精到分析。具体到学科的讨论,确有必要指出,在近代之初(耶稣会士来华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重要的是,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而是各自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不妨接受这样的前提,明末肇端的欧洲与中国的第二次互相接触,“两种文明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人成了主角: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前者是当时欧洲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后者则是传统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文人”。

与确立问题的起点相比,判明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标志,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很难有可以作为衡量依据的标准。唯一可行的是透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对此略加说明。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将长期存在。从时间上说,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学科成形的关键时期,如钱穆指明的,“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所谓客观标准,指的即是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建立起来,学术有了新的评价体系。而参与论战的许多人,都是中国现代各学科的奠基者,他们在论战中所表达的意见,也预示着中国现代学科成长的方向。不妨多说几句,了解有关这场争论的枢机所在。

争论肇端于张、丁二人或远离自己的专业训练或简单地把不同的学科等同起来,将话题引向似乎是根本性问题的所谓“科学方法”、“最后之因”、“形而上学”之类。原本隔岸观火者卷入战团,则是从自己的专业训练出发,颇觉争论中频频出现的新学科名

词,远不是那么回事,又来辩驳一番。最早提出休战倡议的张东荪就看到了这一要害,认为这样的大问题还是不必争论下去的好,“因为争论下去必定强学哲学的人来临时抱佛脚谈科学,同时强学科学的人临时抱佛脚谈哲学,这当中便难免不有疏忽。这事太不经济,还是其次,而给社会以恶影响,则为害却大”。因此,卷入这场论战的数十位学界名流,“科学派”也好,“玄学派”也罢,都在证明着以“科学”为标识的这一知识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精神凭藉。作为论战的始作俑者,张氏似乎要在科学泛滥之际为人生观保留一方净土,但从他的话语里我们仍可感受到“科学”的伟力。张君劢试图辩护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的成就,“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表达出捍卫本土文化遗产,尤其是倡明宋学的决心。但他的论式也清楚显示,中国思想资源其独特的价值也是需要经由西方的经验予以确证的。言及宋学有倡明之必要时他就多次说到,柏格森的理论与我“先圣尽性以赞化育之义相吻合”;“昔之儒家有学禅之实而不欲居禅之名,吾则以为柏氏倭氏言有与理学呈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扩弃之”。就此而言,那些在论战中似乎扮演旁观者角色的学者,话里话外,也为此作了注解。孙伏园就表示,“玄学、哲学、科学、人生观都是活着的名词,他们的对象都有许多人研究,他们的关系都是今日切要的问题;汉学、宋学、程朱陆王,都是死了的名词,他们的对象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材料,现在中国社会上几乎一点留传分子也没有,与现代学术上的名词如玄学、科学、哲学、人生观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张东荪对此也有同感,“丁先生怕西洋玄学投入中国的宋学,来借尸还魂,这个精神不但我原谅丁先生并且还有些敬服;只可惜丁先生同时却把科学投入汉学,做一个同样的借尸还魂”。而张君劢也颇有意味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国中号为学问家

者,何一人能真有所发明?大家皆抄袭外人之言耳。各人读书,各取其性之所近者,从而主张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对这场论战的总结,才会武断地以“科学的人生观”消解“科学”与“人生观”的论辩,他所阐发的十项戒律,尤其是那一连串似乎是不容质疑的语句——“根据……知识,教人知道……”,和文中频频出现的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表明这场论战还有着以往人们忽略的一层象征意义:近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即社会理念合法性的知识学基础,已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换为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现代型知识。

可以看出,现代学科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自有其重要性。这一过程不仅决定了中国当代学术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大量以现代学科样式书写的历史回顾,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的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都受到自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所接受的学科术语的影响。尤有甚者,上个世纪由中国读书人感知、重建和传播的关于“中国之过去”的图景,也同样受到这些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学科概念的制约。也正因为如此,内中所涉及的不少课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关键在于课题本身涉及到各种复杂因素。例如,时间跨度(跨越了被视为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1840年,该年份一般被认定为“前近代”与“近代”的分水岭)、语言难题(相关文献不仅以中文和多种现代欧洲语言书写,而且还有用日文和拉丁文书写的文献)、相当多的书目不确定(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文献保存最糟糕的时期之一,还出现了报纸杂志等新的传播媒介),最后,还缺乏坚实可靠的研究方法作为基础。

问题转向西方,困惑也同样存在。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是否对科学的进程

和形态产生了持久而连续的深刻影响？西方科学史学界就有长期争辩，并形成了著名的“连续性问题”，“中世纪主义者”（medievalists）和“早期近代主义者”（early modernists）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有必要强调的是，审视现代学科成长中西不同的视野。西人分析现代学科的成长主要基于“学科建制”。所谓学科建制，指的是现代知识以学科为标识进行的制度安排。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揭示的，19世纪后半叶（约1850—1914年），主要有三种方法促成了学科的制度化：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系统。具体到某一学科，如史学，就不乏这样的看法，西方史学传统从名义上发轫于两千多年前，但截至18世纪，历史研究也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学科和“科学”的地位，拥有自己复杂的历史，并取得一种职业地位。本辑所译阿梅龙（Iwo Amelung）讨论“物理学的命名”的论作中，也明确提出，假如要对科学探究中的一个科目——物理学的内容尝试进行分析的话，将会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存在非常不同的情况。然而，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19世纪上半叶是决定性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人们勾勒出物理学学科的边界，并将物理学确定为高等学术机构中所讲授的独立科目。这一过程，一直以来被称为“物理学的发明”。它起始于18世纪，当时曾作为“自然哲学”同义词而被使用的物理学，从“自然史领域”脱离出来（尤其是因为林耐和其他学者的分类学成就导致知识分类问题凸显），并且在19世纪初进入其发展的决定性阶段，而在此期间化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反观中国，从一开始就陷入种种谜团。康有为描述接触西学之初始，曾有这样的评说：“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

之,为最要事。”相似的意思,梁启超也有所阐述:“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不宁唯是,对于治西学当有的选择——“如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梁还指出普遍存在的情形是“不得其途经”,“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康有为、梁启超上述常被征引的话,自有其深意在,绝非仅仅关涉于译书,而是展现了晚清士人在分科观念影响下,对西学的接纳颇为关注学科之次第,并着力于辨析“西学门径”,以便更好地“采西学”。

即以梁启超来说,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曾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而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梁氏又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这些都往往令人产生歧义,也预示着检讨相关问题的困难。大致说来,基于中国背景检讨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则需要考虑到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与“西学”传入相关的著作、文章,包括译作及独立文本;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新术语在中国思想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应用。二是对“知识分科”发生的制度和社会背景进行详细分析。主要关注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应及对这段历史的重构。大概包含着这样一些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各学科术语在中国的译介,以及形成规范性用语的过程;第二是有关某一学科论著的系统出版,包括翻译和编译的论著;第三是在教育体制中各学科在各级课程中的设置;第四是相关的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建立;第五是各学科中国历史的书写;第六是社会舆论方面对各学科知识的反映。从上述六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历史进程探讨,这是我们多年来从事这一课题的体会,或也可以以

此对照已有研究成果的得与失。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尽管相关研究也多有所见,但往往只是在局部或某些片断有所突破,其中的复杂性,仍未得到充分发掘。或许可以说,“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仍是一个极其复杂、尚待进一步开垦的研究领域。大致说来,对于学科术语的清理,已有不少可资参考的论作,如实藤秀惠《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及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同时基于晚清“学战”意识的提升及由此引发的“权势转移”,研究者也多有讨论。如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及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这些著作尽管不是直接讨论中国现代学科的成长,但涉及对晚清思想文化发展的把握,仍然值得重视。

以往对中国现代学科建立的研究,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资料上的梳理严重缺乏,对于民国时代中国各学科的成型,倒也梳理了不少资料,规模庞大的《民国丛书》即是被广为使用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尚远为不够,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清理明末清初以来的资源,尤其是传教士所留下的大量资料。在许多论著中对这些资料只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目录,而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没有加以充分利用。第二,研究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是一项时间跨度约400年的课题,研究者也需要具备16世纪至20世纪的知识。但我们熟知的中国的研究领域通常是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两段,甚至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对于晚清的状况

况都不甚了解。相应的,很多研究只是勾画出某项学科在中国建立的片段,而鲜少就某一学科的建立进行系统阐述。第三,现代学科的建立一个基本的标志即是分科观念的形成,今天对于现代学科形成的研究,往往也分割为不同的领地。如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往往是由中国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担纲,文理学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在做些什么。或许学术的深入研究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的格局,问题在于,现代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学科概念,要了解学科的形成,还必须突破这样的学科分野,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些学科。实际上学科之间彼此本有很密切的关系,如不能对此有系统的把握,单一的考察某一学科的建立,很多问题势必难以厘清,也不利于进行深入考察。第四,中国学者的一个难题。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既是“援西入中”的产物,因此如不能了解西方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难以理解其中的脉络。

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这一课题,或许是需要中西学界通力合作才能很好进行的课题。收入本辑的论文,即涉及到上述不同层面。显然,这些论文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好在此项工作还将持续下去,其他方面的论作也将陆续推出。继2005年9月举办的学术会议之后,2006年10月我们又举办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以学科术语为中心的讨论”,而2007年会议也在规划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版更多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论著,以就正于方家。

编者谨识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稿约

一、《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不定期出版物。

二、本集刊为一学术性的研究集刊,园地对外开放。惟本集刊每辑均有一主题,欢迎各位研究者向本刊推荐有关主题,并提供有关研究信息。

三、欢迎研究者根据本集刊所设定的主题及大致栏目惠赐大作。字数不限。惟来稿必须未曾在任何报章、刊物、书籍或出版物发表。

四、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学术简历、通讯地址、电话或电邮地址,以便联系。

五、来稿请按本刊撰稿格式写作,并附中英文摘要,以利编辑。本刊收稿后两个月内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意见,恕不退稿。来稿一经采用,即付薄酬。

六、来稿请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编辑部(邮编 200433);也欢迎作者以附件的方式发至下列地址:history@fudan.edu.cn。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编委会